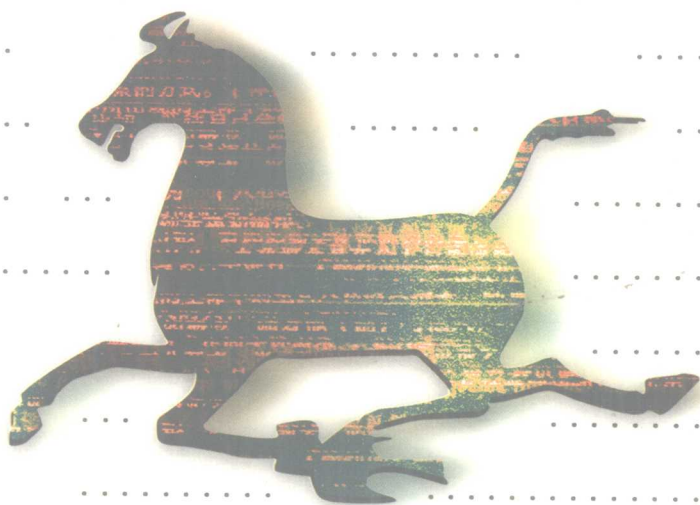


旅游学新视野

旅游人类学

Lü You Ren Lei Xue

张晓萍 李 伟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旅 游 人 类 学

张晓萍 李伟 著

南 开 大 学 出 版 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游人类学 / 张晓萍, 李伟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310-02950-1

I. 旅… II. ①张…②李… III. 旅游业—社会人类学
IV. F5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605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1.25 印张 3 插页 389 千字

定价: 4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序一

现代旅游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研究。然而,单一学科研究往往会出现“水中月、镜中花”的简单化研究,表面上清晰明了,但实际并不能揭示旅游现象背后多重因素相互纠缠的复杂本质,更不能在旅游实践中起到指导性的作用。由于每一个学科都是伴随人类社会的进步逐渐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有着比较清晰的边界,因此面对“泛化”的旅游现象,很多学科的单一研究都显现出“力不从心”。旅游研究中学术泛化的关键不在于参与学科的多寡,而在于各学科之间缺乏一面“镜子”,发现各自研究的偏差,根本原因是没有一致性的可参照理论体系与研究坐标,使传统的单元研究显得残缺和苍白。

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的旅游人类学思想开始被引入我国的旅游研究。人类学本身对“人类生活”的研究特点,使人们发现运用“文化”工具诠释旅游现象更加接近事实的本质。故而,从对旅游现象的认知层面上,我国旅游学界开始接受并认可了“旅游人类学”。但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经济水平和旅游发展道路与中国大相径庭。西方旅游人类学思想对中国旅游实践及旅游事实的解释总给人一种不明就里、隔靴搔痒的感觉。而大量西方文献在中国旅游研究成果中的引用,也使旅游研究的混乱局面更加复杂化了。于是,一批学者开始反思西方的旅游人类学思想,对旅游人类学的体系、内容及表述方式进行“本土化”建设,力图避免“道听途说”式的研究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由张晓萍教授等新著的《旅游人类学》的出版,是有其深意的。

在这部《旅游人类学》中,一改早期旅游人类学的传统表述方式,既借鉴了国外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又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而是充分探讨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旅游人类学理论体系和内容,显示出作者独立思考的风格与品质。特别是作者在其旅游教学和实践研究中的大量积累,成为旅游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依托,也将成为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的基石。因此,希望这部《旅游人类学》专著能够发挥其抛砖引玉功能,推动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更加成熟和完善,故乐此为序。

罗明义

2007年10月25日

序二

我非常乐意介绍张晓萍教授的这本新专著。这本书结合当代中国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一些重要的旅游现象进行了透彻的人类学的思考。该著作涵盖了大多数重要的理论和应用研究的论题。因此,本书将会为人类学、旅游学以及当代世界的其他重要学科的学生提供较为先进的知识储备。张教授在语言学、管理学、人类学方面都接受过完好的训练。她作为访问学者,曾到过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其中1997年、1999年至2000年在人类学系学习,2005年至2006年在海斯(Haas)商学院学习。她出版了大量中文著作并多次获奖。这不足为怪,因为她来自很有名望的白族学者家庭,父亲张文勋先生是云南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著名教授,现已退休;妹妹张鹏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中国城市的杰出学者。

张教授因其杰作《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而知名。她利用在国内和出国的各种机会,借助相邻学科充实自己的知识。通过这本书,她使自己的成果站在了中国当今旅游研究的前沿,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并带给学生知识和智慧。与张教授合作已有十幾年,我感到非常愉快,并希望今后我们的合作会有更多成果。

纳尔逊·H. H. 格雷本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研究生院教授
北美民族学 P. A. Hearst 博物馆馆长
加拿大研究项目 Thomas G. Barnes 杰出教授

Preface

I am delighted to introduce this major new book by Professor Zhang Xiaoping. It is a very thorough anthropological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ortant phenomenon of tourism, both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s approached by Western scholars. This book covers most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at both a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research level. Thus it will provide an advanced level preparation for students of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and of key process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ofessor Zhang has had very thorough training in languages, management and anthropology. She has been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in 1996–1997 and 1999–2000 and in the Haas Business School in 2005–2006. She has numerous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and she has won many prizes. This is not surprising since she is part of an illustrious academic family of Bai nationality descent, being the daughter of the famous classical scholar Emeritus Professor Zhang Wenxun of Yunnan University and she is the sister of the eminent scholar of urban China, Professor Zhang Li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Professor Zhang Xiaoping is already well known for her excellent book 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Ethnic Tourism*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She has taken advantag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ies to expand her knowledge in a number of adjacent disciplines and with this book, she puts her work in the forefront of scholars studying tourism in China today, brings honour to her university and wisdom and knowledge to her students. I am happy to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her and her work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further fruitful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Nelson H. H. Graburn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Curator of North American Ethnology, P. A. Hearst Museum,

Thomas G. Barne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Canadian Studies Program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前 言

200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之年。在这一年中,我经历了很多,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生活的、学习的、工作的……当然,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旅游人类学》一书的写作,并在2007年的11月份向南开大学出版社交上了该书的初稿,完成了人生的又一个“仪式”。回首往事,我感触甚多,因为也就是在十年前,1997年的11月,我第一次远涉重洋,踏上了美国国土,第一次走进伯克利这所美丽的校园,第一次见到了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教授,第一次接触了“旅游人类学”——这在当时的中国还鲜为人知的新兴学科。当时,我那种“如获珍宝”的喜悦和兴奋之情,使我对这一新兴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从此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道路上走过了整整十个春秋!在这十年间,我先后于1999年和2005年两次再赴美国,在伯克利这所世界著名的学校,师从著名旅游人类学家格雷本教授学习。我曾有幸在华盛顿、旧金山、伯克利等国际会议上,与一些著名的人类学者、社会学者进行交流,其中除了我的导师、著名学者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外,还有戴维斯大学著名社会学家迪恩·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伊利诺易斯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埃德华·布鲁诺(Edward M. Bruner),加州州立大学瓦伦·史密斯(Valene L. Smith)教授、丹尼森·纳什(Dennison Nash)教授和玛格丽特·斯旺(Margaret Swain)等旅游人类学家。我不仅聆听了这批被称为“恐龙级”的旅游人类学家所作的精彩学术讲座,还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与他们进行了近距离的接触、交谈,十分敬佩他们的深厚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充分感受到了他们谦虚、随和的人格魅力。此外,我还于2003年见到了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另一位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东京大学人类学系的著名教授山下晋司(Shinji Yamashita),并荣幸地应邀在东京大学给他的研究生作了“民族旅游在云南”的讲座。2007年12月在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一次会议上,我又见到了以色列希伯莱大学著名社会学家艾瑞克·科恩(Erick Cohen),1999年10月在中国云南大学所召开的“中国、旅游与人类学”大会上我就见过他,他有关旅游的著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我在美期间,也遇到了一批年轻的学者,如《旅游与现代性》的作者Timothy Oakse就是其中之一。总之,能在一生中遇到那么多的著名旅游人类学者,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受

到很大影响,所以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写一本给中国读者读的旅游人类学书籍,把西方的旅游人类学引进来,结合中国实际,以期促进我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这种愿望,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责任感,在我心中整整沉积了十年!在这十年间虽然已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在国内发表了第一篇介绍纳尔逊·格雷本教授与旅游人类学的文章,首次翻译、出版了由瓦伦·史密斯教授主编的有关旅游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中译版,2001年),还主编了一本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论文集《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2003年),但要出版一本有关旅游人类学的较系统的论著的想法一直未能实现,直到2006年年底,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孙淑兰老师亲自从天津来到云南大学找到我,向我约稿,撰写《旅游人类学》一书。记得我曾对孙老师表达过我这一多年的写作心愿,但由于教学工作忙,一直无暇下笔。这次孙老师给我很多鼓励,我终于开始思考大纲,并组织了一批“精兵强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该书的初稿,积在我心中多年的心愿终于得以实践!我深知自己学识粗浅,靠我一个人完成这部专著是不容易的,好在有我们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他们都是多年从事人类学、旅游学研究并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大家通力合作,终于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书稿。犹如十月怀胎的“胎儿”很快就要出生了,可能还是一个娇嫩、孱弱的孩子,但她毕竟出生了。不管她是丑是美,她毕竟是第一个“孩子”。如果还有“先天不足”的话,那么还可能“后天补”,今后不断修改加工。但愿该书的出版,能给有志于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参考,引起一些思索。

该书总共由十章组成,它们分别是:第一章“旅游人类学及其理论概述”、第二章“追寻人类的旅游足迹”、第三章“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与文化”、第四章“旅游体验”、第五章“仪式:神圣的旅程”、第六章“涵化:旅游与文化变迁”、第七章“‘真实性’: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第八章“博物馆:人类历史文化的多角度展示”、第九章“旅游人类学方法”、第十章“关于旅游人类学认知的思考”。该书的最大特点在于以下几点:(1)在评介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并把一些重要的理论引入到了我国旅游的理论研究当中;(2)结合中国旅游的开发现状,用东、西方旅游人类学的视角去审视和反思我国旅游业目前的发展状况,并对许多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尽量做到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3)本书在旅游管理研究的基础上,融入旅游人类学的理论,使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和从事旅游管理的同志们能逐步接受和理解这一新学科,并学以致用,从理论上使旅游学的研究上一个新台阶。本书对于从事旅游人类学研究以及旅游业工作的人员也有参考的价值

该书是集体合作的结果。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章:张晓萍、赵红梅

第二章:张建雄

第三章:伍乐平

第四章:赵红梅

第五章:蒋俊、郑晴云

第六章:毛伟

第七章:张晓萍

第八章:李燕妮

第九章:赵红梅

第十章:李伟

本书的大纲设计、写作体例及全书的统稿由张晓萍、李伟完成。

在本书完稿并交付南开大学出版社之际,我要代表全体作者,再次感谢孙淑兰老师和南开大学出版社。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编刘晓女士。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这次写作和出版的机会,并为此付出大量心血,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们也希望读者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在以后将不断修改提高。

张晓萍

2008年1月于春城昆明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1)
Preface	(1)
前 言	(1)
第一章 旅游人类学及其理论概述	(1)
第一节 旅游人类学的产生及其发展	(1)
第二节 旅游人类学研究理论	(17)
第三节 旅游人类学研究目的及其现实意义	(27)
第二章 追寻人类的旅游足迹	(34)
第一节 为生存而进行的族群迁徙	(35)
第二节 随生产方式变化出现的人类空间位移	(41)
第三节 人们对世界图景的探索	(47)
第四节 现代生活样式之一:旅游	(53)
第三章 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与文化	(58)
第一节 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	(59)
第二节 旅游与文化的理论研究	(69)
第三节 旅游与文化的实证研究	(82)
第四章 旅游体验	(93)
第一节 体验	(95)
第二节 旅游体验	(102)
第三节 “共睦态”——一种阈限体验的解读	(115)
第五章 仪式:神圣的旅程	(128)
第一节 作为仪式的旅游	(128)
第二节 朝圣:宗教文化之旅	(153)
第六章 涵化:旅游与文化变迁	(176)
第一节 文化变迁	(176)
第二节 涵 化	(183)

第七章 “真实性”: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204)
第一节 “真实性”与“舞台真实”	(204)
第二节 “舞台真实”与商品化	(210)
第三节 旅游背景下的“舞台真实”及其案例研究	(213)
第四节 “舞台真实”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219)
第八章 博物馆:人类历史文化的多角度展示	(224)
第一节 博物馆与旅游业	(224)
第二节 博物馆旅游的人类学视角	(229)
第三节 我国博物馆旅游的现状 & 展望	(236)
第九章 旅游人类学方法	(243)
第一节 旅游人类学研究方法	(245)
第二节 案例:丽江玉龙县白沙乡民族旅游田野调查	(258)
第十章 关于旅游人类学认知的思考	(264)
第一节 关于人类学的理解	(266)
第二节 关于旅游学科研究的认识	(273)
第三节 关于旅游人类学的思考	(291)
参考文献	(318)

第一章 旅游人类学及其理论概述

随着旅游业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发展,学术界对旅游的研究已从单一的经济视角,转向了多角度的理论研究,其中旅游人类学 20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已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新兴学科。到了 20 世纪末,我国学术界也对这一学科给予了广泛关注并开始研究。旅游与人类学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其中涉及哪些主要理论?对世界旅游业发展,乃至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有何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本章就拟对这些问题作简要的介绍。

第一节 旅游人类学的产生及其发展

一、旅游与人类学

旅游与人类学从学术上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或者说听起来是两个没有联系的领域,但它们之间的确产生了联系,这与人类的社会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经过许多学者数十年的研究,人们发现,人类学不但与旅游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从人类学角度对旅游进行研究已变得势在必行。离开了人类学的研究,旅游业的发展将碰到许多问题,产生许多不良影响,最终有可能导致人类社会的变异,其中包括文化传统的丧失、自然环境的破坏、资源的耗竭等人类社会问题。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耸人听闻,或者说有些过分,但已被许多事实证明。反之我们也发现,如果用人类学的理论和观点来研究和指导旅游的发展,许多由于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解决,并使旅游活动真正成为人类社会有意义的行动,同时还会给社会文化带来积极的影响,做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达到我们进行旅游活动的理想目的,即通过旅游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这些也被许多事实证明。旅游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伯林(Berlyne)称之为“人类探索行为”,特别是现代旅游,它的产生和发展包含了许多文化的内容,例如仪式、艺术、迁徙、民俗、娱乐、审美等。这些东西都是人类活动不可或缺的。而人类学正

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的学科,是一门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内容广泛的学科。从这个角度来说,用人类学的理论和观点来研究旅游,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众所周知,“人类学”最早是一门西学,16 世纪初这个词产生于希腊文 anthropos(人)和 logia(科学),即人的科学。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人类学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而后者包括了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及社会文化人类学。我们现在说的人类学,一般指的就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通过跨文化的方法,研究和比较不同民族、部族、国家地区 and 社区的文化的异同,以寻找文化的共性和异性。该学科的另一特点就是人类学的研究与其他学科会产生交融和渗透。这些学科包括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学、艺术、宗教学、语言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等等。从研究内容上看,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文化的构成、起源、生成和发展,核心的问题是研究文化的特征,以及引起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对于文化的特征,一般认为有下列几种:共享性、习得性、整合性、象征性、适应性及变迁性;而文化变迁又包括文化的传播、文化的同化、文化的涵化、文化的融合,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是一个特定社会代代相传的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技术、价值观念、信仰及规范。按照博厄斯(Boas)的定义,文化包括了社区中所有社会习惯、个人对其生活的社会习惯的反应,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人类活动。按照英国人类学家泰勒(Tylor)的定义,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化就是人,人就是文化;只有正确地认识人,我们才能了解什么是文化。

关于什么是旅游,或者说怎样对旅游下定义,什么是旅游者,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可以这样说,远古时期的旅游与我们当今的旅游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或者说在旅游真正成为一个产业之前,人们的旅游方式和旅游目的与现代旅游相比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是我们在追溯旅游历史沿革的时候也不难发现,早期的旅游与现代的旅游在精神方面有着许多惊人相似的地方。不管是旅行或旅游,人们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和动机,而这些又取决于人们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会对旅游作出不同的旅游方式的选择,这就我们需要从人的文化角度去加以分析和研究。而在这方面,它恰好和人类学的研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什么样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旅游方式,为什么有的人要外出旅游而有的人又不愿去,人们外出旅游的目的和动机为什么又是这样不同。总之,我们研究的是旅游者,研究的是人。在这一点上,不是和人类学研究的一样吗?在研究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会研究旅游的景观、景点和旅游者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

关系,而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则更多是从社会文化方面来进行的。

我们知道,从古至今,人们在旅行和旅游当中,除了欣赏自然风光,领略异地文化以外,还会把自己的文化带到异地,或者在旅游当中受到异地文化的影响。这种现象从旅游活动一开始就产生了。这种双向的活动被人类学家称为“涵化”。这种现象引起的东道地的变化被人类学家们看成“文化变迁”。虽然旅游不是造成文化变迁的唯一或主要的因素,甚至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不要把旅游看作文化变迁的替罪羊,但旅游活动的确会加速文化变迁,因为在文化传播方面,旅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已为许多人类学者所承认。因此 20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出现了对旅游的人类学研究,出现了以美国为主的研究旅游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和旅游从此构成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那就是“旅游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在美国,当时出现了许多学术期刊,里面刊登了很多关于旅游与人类学的文章,它们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得以出版。最早的期刊被称为“旅游研究年鉴”(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于 1983 年出版,有关旅游的词条也分别在 1984 年的《社会学年度评论》(Annals Review of Sociology)和《人类学年度评论》(Annals Review of Anthropology)上发表。第一本开创性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专著《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于 1977 年作为首版,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先驱,使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在学术界得到了正式承认(该书后来又于 1989 年第二次和 2000 年第三次再版,第三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之后,与此有关的其他著作也相继问世,如著名学者德卡特(Dekadt, 1977)和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的著作在当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文章、著述和期刊的出现,标志着旅游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正式诞生。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如何分辨现代化和旅游业在文化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许多运用性的、带有阐述性的问题使人们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同时又涉及了其他学科,如政治经济学、社会文化学、符号学等。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开始涉及更深入的问题,如现代、后现代以及全球化、伪现实等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旅游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旅游人类学首先关注对旅游者旅游动机的研究,以寻求现代和后现代的建构和内涵。人们一般都认为,一名旅游者就是这样的人:他自愿花休闲时间离开自己的家,到某个地方去旅游,去经历某种变化。当许多人都同意这种观点的时候,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旅游者外出旅游都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动机的,因而出现了一些特殊类型的旅游者。所以,我们就应该根据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动机对他们进行分类。由此而出现了大量的有关旅游动机的研究,如朝圣旅游、休闲旅游、观光度假旅游、商务旅游、探亲访友旅游、文化旅游、民族旅游、生态旅游、探险旅

游、乡村旅游等形式多样的旅游,都为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素材。随着时间的变化,以上这些旅游已变成大众旅游,世界各地都纷纷开发旅游业,因为旅游业的发展为他们本国的经济带来了可观的利益,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已成为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人们逐步意识到,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消费,也是一种文化消费。在旅游活动当中由旅游引起的文化现象,如文化商品化,也引起了旅游人类学家极大的关注。旅游活动不再被看作单纯的经济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和发展的问題长期以来一直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就东道国或地区来说,它们是旅游商品的生产者,它们所提供的商品或旅游产品及旅游服务是旅游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旅游研究的早期,西方研究者们把旅游看作一种帝国主义形式,认为旅游业的开发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是都市富人对穷人的“侵略”和“殖民”。这些负面的影响包括旅游业造成的贫富差距、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遗产的破坏等。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也有许多学者发现,如果对旅游业加以管理、控制,就会给乡村或城市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和变化。一种较为温和的观点认为,采取可替代旅游对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另外,当地人在旅游活动当中可以积极地与旅游者互动,可以与国内及国外的有关部门保持联系,还可以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等保持积极的联系,这对他们开发旅游业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那些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可以帮助旅游开发者寻求旅游支出和回报的平衡。旅游业的开发将生活在“保护区”的当地人及其文化进行推销,这一做法成为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相对于旅游者来说,性别差异、种族差异、民族差异、年龄差异以及地方差异等产生了一种等级关系,对旅游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来说,也成为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的基础。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用民族志的田野作业法及用交叉性的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都为旅游主体与客体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翔实的资料。这些翔实的资料又被用来构建一个广泛的、跨文化比较的旅游民族志研究。总之,旅游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十分广泛,除了以上的研究内容以外,还包括了女权主义、生态学等,这些研究都与旅游的活动有关。

其实其他领域的学者,如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他们在人类学家对旅游进行研究之前就开始研究旅游的效应问题,并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学者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曾引起了世界各地学术界的关注。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致力于研究被称为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人民,但他们没有把他们看到的旅游活动与他们的研究结合起来。其实很多问題是值得反思的,如:怎样看待旅游者?目的地人民为什么对旅游者的到来感到不愉快?目的

地的文化是怎样被炒作的?这些东道地被冠以“奇异”、“神秘”、“天堂”、“梦幻”、“独特”等名称,以吸引大众旅游者。对此,有些西方学者表现出了极力的反对。他们把旅游看作一种肤浅的活动。尽管全球旅游的迅猛发展带来了许多正面的环境影响、社会文化影响和经济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学家都认为旅游是一个值得开发的大产业。他们认为,把地方知识系统和全球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就会导致一些问题,如:旅游者的经历是否具有“真实性”?“他人”的一切是否是真的?如何诠释“真实性”?对于这些问题,旅游人类学家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还有其他与旅游业有关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如旅游带来的人口迁徙问题,人口置换问题,地方、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建问题,文化的重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等。因为在当今这样一个有着不同地方、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跨国市场上,旅游业体现了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力量。

在旅游研究当中,人类学还包含了对人类相似性及差异性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以对旅游者消费符号的研究为主。如民族风情、地方遗产、与现代相对应的传统生产、人类安居的历史、艺术品、舞蹈、戏剧、音乐、仪式、语言、环境的适应、社会规范及人口移动,不同的游客对这些东西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因此构成了不同的旅游吸引物。当地人以往为自己生产的艺术品、工艺品,现在变成了制作简单的、大众性的旅游复制品和旅游纪念品;遗产地的旧建筑物和景观被重新修复后向游客展示,以重现昔日的“传统”风采;同时许多新的文化主题公园被建造,如迪斯尼乐园、民族村、文化中心、生态博物馆等。这些文化的“生产”和“再生”都是为游客而进行的。此外,考古研究的信息和考古文物的发现也成为了旅游吸引物,因此重建的场景旅游深受文化旅游者,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欢迎。通过对博物馆的建设和对旧的场景的复制,许多“真实”的文化被认为得到了保护。体质人类学家也提供了一些研究的素材。一些早期的场景在博物馆的展出和一些带有阐述性的灵长动物的展出把人类和他们的祖先联系在了一起。旅游人类学的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度假来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有一些志愿者与社会文化人类学者、体质人类学者和考古学者一起工作,帮助他们收集资料。语言人类学家可以为旅游市场营销提供社会语言的分析,重点研究消费者的思想文化要旨是如何形成的,同时也反映了市场的影响力。

人类学家在对旅游的研究过程当中,同样重视实证研究,即到他们进行研究的区域中去,与旅游者一起旅游,同时注意参与、观察旅游活动。这样的方法被称为“民族志旅游”。旅游人类学的这一研究方法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将进行专门的探讨。另外,许多西方人类学家还认为,应该公平地对待那些贫穷地区的旅游开发者,他们应是主要的受益者。当然,旅游目的地地区的居民也应该考虑到与政府部门及投资者、旅游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对于整个旅游业的

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旅游与人类学被联系在了一起,这不仅从理论上来说是必要的,在实际操作中也是必要的。

二、旅游人类学的对象及主要内容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旅游的本质作界定。不同的学者对旅游本质、或旅游的动机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更有着深刻的意义。美国的著名旅游人类学家、该领域的先驱者之一瓦伦·L. 史密斯(Valene L. Smith)在她开创性的论文集《东道主与游客》中开宗明义地说道:“要对旅游一词下定义是困难的……但一般来说,一名旅游者指的是一个暂时休闲的人,他(她)自愿离开自己的家,到某一处地方参观、访问,目的是为了经历一种变化。”^①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旅游动机,但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构成了一个等式,那就是:旅游=休闲时间+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积极的对旅游目的地的认可。^②我国学者彭兆荣也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人类的旅行文化早就开始了,严格地说,有了“人”的认定、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旅行也就随之产生了。而从古代的旅行到旅游,反映了人类社会巨大的历史变迁。现代的旅游成为索解现代社会现代性“迷思”和“神证”的一个最好注疏,而人类学正是一个专门解释人类社会“迷思”的学科。^③美国另一位著名人类学者丹尼森·纳什(Dennison Nash)在其理论性著作《旅游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一书中,也从三个角度分析了旅游的产生,它们分别是:(1)从目的地社会的角度;(2)从旅游者的角度;(3)从客源地的角度。这三个角度与一些学者提出的旅游业当中的“主体”(即游客)、“客体”(即东道地)和“媒体”(即旅游机构、部门、政府组织)等十分接近。国内有的学者根据在国外的学习和研究,认为应将旅游人类学研究划分为两个维度,即关于游客的研究和关于旅游业对目的地影响的研究,认为分析游客的旅游动机、体验及旅游对游客的影响,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两大主流。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对旅游本质的研究都要涉及以上问题。而旅游人类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是要从人类学的视角,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分析和阐述,以便从旅游业开发这一表面的现象中,窥探到人类社会深层次的东

① (美)瓦伦·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何昌邑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第1页。

② (美)瓦伦·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何昌邑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第1页。

③ 彭兆荣:《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2页。